

祖國的召喚

謝應芬

留越國軍絕食抗法記

突圍入越假道回台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九日，我隨國軍第二十六軍，自滇南蒙自經過對匪軍數日一路血戰，抵達越南猛梭，這是萊州省一個郡級行政單位所在地，駐有法國軍隊一連。中越兩國的交界線，是一條大約二百公尺的小河，沒有固定的橋樑架設，我們這批為數二千多人的部隊，由兩隻小舟往返載運，費了一整天的時間，纔渡完畢。法軍見我人多勢強，除了聽任我們進入越境外，別無對付辦法。當繁營就緒後，經派員與法軍部隊長交涉，聲明我們是假道至海防，候船去台灣，請他轉報河內法軍最高指揮官亞力山里將軍，念長交涉，說明我們是假道至海防，候船去台灣，我們假道回台的要求，並在過境期內，予以必要

的協助。

我們在此一面稍事休息，一面等候答復。當天晚上，我同少數幾位高級人員，被安排住在都長官邸，將近午夜，我打開客廳的收音機，即聽到共匪的廣播，正在對匪軍大喊大叫：「不要追進越南，引起外交糾紛」。當時我把這一消息，立

刻告知那位郡長，讓他安心，不必存何顧慮。同時請他轉告法軍，我們停留幾日，決不會引起邊防的戰事。但是法軍部隊，仍然戒慎恐懼，十分緊張。

一月二十日下午，接到亞力山里將軍的回電，那位法軍連級指揮官，沒有把電報的內容通報我們，祇是叫我們迅速準備開拔，雖已快到黃昏，還是沿着公路前進三十公里，在曠野中宿營。從二十一日起，法軍派出一個班，擔任沿途嚮導，和分配空投補給。我們也將部隊略事整編一番，區分三個梯隊，作長途行軍的打算。

雖然，我們不知河內復電內容，可是大家總從好的方面猜測：說不定是法方已經接受了我們所提假道的要求。最巧的是，當我們行經駐有法軍的地方，他們口叫：「海防，海防」。並以手式表示我們就要上船離開，越發增加官兵同台信心，提高不畏途跋涉的勇氣。有些幹部想到他們已被接送抵台的家屬，不久即可骨肉重逢，更是興奮不已。南國春早，一路蕉黃榔翠，鳥語花香，幾乎使這些百戰餘生的軍人，忘懷了幾天以前砲聲彈光的恐怖情景。

憤背諾言中途繳械

二十五日，到了距萊州省祇有四十幾公里的清水河，一個盡是竹料搭建的大村莊，幢幢茅屋離竹舍，寂無一人，好像是臨時騰空，等候我們進住的。少數法軍，看來也是到此不久，值得懷疑的是他們為何官多於兵。清水河是一條既寬且深的河道，上接猛梭，下通河內，水流甚緩，四處張望，竟找不到一隻渡船，如此情況，益覺不妙。經派人找法軍詢問：不到宿營時間，為什麼要在此處停下？一位來自河內的校級軍官答復說：「依照國際公法，本應在你們入越之處，就要全部解除武器，祇因過於接近中國邊境，當時的情況，不宜讓你們在那地方久留，特等到此處，才依法提出這種要求，希望多予合作」。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立刻引起全體官兵莫大的反感，有些官兵更是怒氣沖沖，寧願回頭打游擊，也決不向法軍繳械。軍長彭佐熙中將，召集高級幹部，共商對策，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兩個方案，報請政府核示：一案是回頭沿中越邊境，走向泰滇交界地區，會合我軍羅團，相機推進雲南

車里，佛海，南橋三縣，建立據點，發展游擊戰。二案是暫將武器點交法軍保管，惟須以同意假道回台為條件，以利政府日後從事交涉。運用我們帶出的通訊設備，連絡上國防部的電台，報出上述兩個方案，隔了一天，收到回示，命我們遵守國際公法，採行第二方案。

事後，我們才明白，國防部所以不贊成第一案，乃是鑒於部隊自越轉泰，路途遙遠，補給與安全，均將大成問題，不宜冒險輕動。同時，由於黃杰將軍統率從廣西進入越南的三萬大軍，已在越境峙馬屯，交出武器，並經與法方訂有協定，獲其承諾假道海防赴台。本軍入越繳械，固然不能例外，將來轉運台灣，尤可援例同行。所以，事實上不容許我們對法抗拒。在全部武器分類造冊交清後，關於假道問題，法軍答應我們派代表到河內去商談。

二十八日，全軍渡河續向河內方向行進。由於我們已無自衛武器，法軍護行兵力有限，為避免越盟部隊的騷擾，確保補給宿營的安全，法軍選擇的路線，多屬偏僻小道，住宿地點，有時在山脈，有時在田間，也偶爾有事先準備的草棚。每天由法方飛機空投的補給品，都能準時如量的送到，足見他們的計劃週詳，連絡確切。這支徒步部隊，雖未荷槍扛砲，然由於士飽馬肥，服裝整齊，看起來仍是威儀萬千，每當經過大村小莊休息時，常有不少的老百姓走近我們，或拱手歡迎，或以筆交談，或送茶水招待，親切熱忱，真令我們既感激，又慚愧！

二月二十日，抵達距河內甚近的山西，這裏建有兩座大型茅棚，足以容納三千官兵的住宿，進住之前，必須脫光衣服，接受類似DDT藥粉的消毒，不分官兵男女，均應過此一關，我不甘受這侮辱，幾番設法閃避，終於逃過去了。第二天清晨，一位美國記者，突然來訪，我逐一答復他的問題，申述我們的願望。他離開時，約好於

一二日內送些書報給我們看，不料一去就未再來，可能是法方從中阻撓。二十三日下午，法軍開來一輛卡車，把軍部幾位高級人員，强行載送到附近一所平房，美其名曰方便改善我們的食宿待遇，其實是在迫使我們與一般官兵隔離，以防留在營中別生枝節。我已暗暗察覺：行至法國在越權力中心愈近，法軍對我們的態度變得愈不友好，這分明是不祥之兆。

送金蘭灣集中軟禁

在山西停留將近半月，除了等到本軍的田團官兵一千五百餘人，歸隊會合外，別無好的發展，我們幾個人終日住在那所孤處荒郊的屋內，心神難安，坐臥不寧。幾度向法軍交涉，讓我們派一代表到河內洽談回台問題，總遭藉詞拖延，不予以明確答復。後經設法，幫助一位隨軍入越的客卿逃至河內，寄望他能找着中國領事館，探聽我們這幾千人禍福未卜的命運。豈知一去，杳無音信。倒是法軍管理人員，有時透露一言半語的說信，我們不久將被送到海防，難道是真有回台的可能，美好的憧憬，激起大家一陣興奮的希望。但一經冷靜轉念，如真有此可能，政府總得先派人前來協調安排，最低限度駐河內的劉總領事應來看看我們。想到這些方面，便覺不可樂觀。

三月二日下午，法軍忽然把我們幾個高級軍官送到河內，住進一所軍官宿舍，既不主動告知我們這一遷移的原因，也不容許我們有何詢問，這是十足對待俘虜的態度，我氣得五內若焚。第二天早晨，我們快要登車他去的時候，河內領事館一位矮胖的閩籍領事，總算找到了我們，他奮不顧身，要衝進來同我們一談，但被兩個法國軍官盛氣凌人的攔阻，祇見這位不甘示弱，愛國情深的領事，以流利的法語同他們對罵一陣，我們含着淚水，一面上車，一面揮手向他致謝。內心無限委屈，壓住陣陣怒火。我閉着眼睛在汽車

上默想着，五年多前，二次大戰結束時，接受北越日軍的投降是我們大中華民國，那時法軍根本沒有過問的資格，中國軍隊在河內橫衝直闖，誰不敬如神明。曾幾何時，我們會在這裏落得這般光景。難道是當年我們因錯認胡志明為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在大戰結束前後，曾一度協助過他的越南獨立運動，今天法軍以這種不友善的態度對待我們，是否存心報復。這一疑慮，繁迴腦海解釋。

經過海洋，下車午餐，同仁們談起河內市區的建築如何高大，街道如何整潔，商場如何繁榮，在我聽來，毫無興趣。下午四時，抵達海防，我們被安置在港口附近休息，傍晚由火車載來了全部官兵和少數眷屬，分別集結於幾個碼頭。七時許分批登上七艘登陸艇，向南奔馳。到了此刻，法方尙不肯說出此行的目的地。浩浩海洋，漫漫黑夜，幾千條性命，就操在七八個法軍的手上，任由他們擺佈，真是可恨復可悲！

三月九日，到了金蘭灣。這個海灣是越南最好的天然軍港。民國三十一年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曾被用作海軍主要基地，發揮龐大的戰略價值。港岸有好幾幢紅瓦黃牆法國式的漂亮洋房，以四幢分配軍部，二個團部，及一個醫院使用。所有士兵營舍，則是我們自行伐樹砍草蓋成的。營區四週，圍有鐵絲網，設有崗哨，三面環海，一面靠山，我們被軟禁於此，無形中成為不戰自投的俘虜。思前慮後，感慨系之，無以遺懷，學成一律如下：

故國輕離痛落荒，為生為死兩茫茫。
三軍彈淚增新恨，萬馬嘶愁惹舊傷。
爭睹漢旌齊刮目，偶聞越語幾迴腸。
傷心棄甲歸無計，夢斷南天又一方。

故國音書無限悲歡

儘管法方在觀念上，也許沒有把我們當俘虜看，在生活上也算盡其力之所及，使我們勉強過得下去，惟有在行動上未能實踐諾言，讓我們早返台灣，僅在集中營內，給我們有限的活動自由，有人說這同對戰俘的看待，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分別，令我們在精神上怎不痛苦，情緒上又怎不憤恨！

金蘭灣距芽莊省很近，每日有飛機來往，交通捷便，所以我們在此住下後，不久就能看到西貢發行的華文遠東日報，從報上欣悉，總統蔣公已於三月一日復職視事，當我們讀到他的復職文告：「際此存亡危急之時期，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週身熱血沸騰，感動欲泣。繼續讀到：「所望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三軍將士砥礪奮發，各級官吏竭誠奉公，為恢復中華民族之領土主權，拯救淪陷同胞之生命自由，維護世界之和平安全，同心同德，奮鬥到底」。大家已經淚眼汪汪，模糊得看不清字了，一時既欣慶國事有爲，復悲傷身不由己！

以後，台灣方面的書刊報紙，也按期源源而來，政工人員，常常綜合自己讀報的心得，定期向各單位官兵作簡要的時事報告。這是當時唯一能提振精神，維繫士氣的有效工作。過不久，弟兄們弄到一架大型收音機，能直接收聽台灣及各地新聞報告，經過一番籌劃，發行一張油印的四開「忠勇日報」。麻雀雖小，肝胆俱全。由於幾位愛好報業的同志刻苦負責，居然能把國際新聞印的要求，成為每人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大家從這張小報上知道政府已在台灣堅強的站起來了，積極推行黨務改造，行政革新，整軍備戰的形勢，更使我們信心大增，勇氣百倍，許多官

兵恨不得馬上從法軍手中拿回我們的武器，重返滇越邊區，結合反共民眾，開闢西南遊擊戰場，接應政府台海反攻。甚至有不少熱血志士，日夜在苦思焦慮，如何分批逃出營區，衝到雲南打天下。我亦為之心動，聽說李彌將軍在泰滇邊區就任雲南省主席，正在組織政府，成立游擊總部，我利用密藏的唯一電台，打出一個電報給當時總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先生，報告金蘭灣營區有政工人員及青年軍同志百餘人，志切請纓，請設法調赴李總部工作。很快接到他的回電指示：李總部編制，尚未確定，希望我們暫時安心留越待命，後來可能是整個國軍行動，受到法方留難，我們始終沒有奉命成行的消息，好不失望。

隨着亞洲反共大局的急變，尤其是當時法軍在越作戰形勢的逆轉，迫使法方對我們的態度，稍有改善，對我們在營區的活動，亦漸多放寬，例如我們掛國旗，唱國歌，舉行各種集會，他們也不再干涉。然而我們忘切報國，心不在此，金蘭灣的風光再美，引起我們的留戀，法國人的態度再好，改變不了我們的初衷。

總統關懷派員宣慰

部隊集中金蘭灣後，最先代表政府來慰問我們的，是駐西貢總領事尹鳳藻，時間大概是在三十九年六月間。他曾委婉地告訴我們：「法國軟禁我們國軍，背上這沉重的包袱，也有說不出的苦衷」。言外之意，好像是受到中共匪軍的某種威脅所使然。但是，他推測我們不會在此久留。這位外交官在我們面前，並未賣弄外交詞令，所以他接着說：「我已奉到政府的指示，正循外交途徑，試向法方交涉，讓你們早日返回台灣」。這是我們在失望沮喪中第一次獲得一線曙光的溫

指揮系統，並以茅草竹木，自行搭建營房，充分表現了中華民國軍人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深表垂念。本來，早在四月就有電報給黃杰將軍，對入越各軍無限關切，並示知已指令國防部會同外交部設法改善我們的生活。祇因這時黃將軍不明二十六軍入越後的行止，無法取得聯繫。因此，總統這番愛護的德意，我們知道得較遲。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總統特派戰略顧問委員林蔚文上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胡偉克少將，專程來越宣慰。他們先到富國島營區，再由黃杰將軍陪同蒞臨金蘭灣，巡視營區過後，我們全體官兵在海邊馬路集合，恭聆幾位長官講述祖國各種進步的情況，分析國際上有利反共的形勢。並由胡偉克將軍宣讀《總統告留越國軍官兵書》，一字一句，都印入每個人的心版，特別是聽到：「戰鬥中的祖國在期待著你們歸來，鐵幕裏的同胞正渴望你們拯救」這兩句話後，大家激動得淚如雨下。此一寶貴訓示，不但穩定了大家不安的情緒，啟示了回台的希望，也更堅定爾後面對現實挑戰的勇氣。

當天晚上，我陪胡偉克將軍在海邊游泳，我們邊游邊談，答完了他的問話後，我問他：「我們在何時回去？」？他不加思索的答復：「快則明春，遲則明冬」。我不敢相信，又追問他一句：「憑什麼把握」。他說：「就憑我下午對你們分析的國際形勢，尤其是韓戰與越戰的變化」。我暗地設想，祇要美國說一句話，法國就有膽量放我們走。自由世界基於台灣海峽的安全，沒有理由不希望我們早日回去，說不定還等着要派上我們的用場。我一直自我陶醉地運用這個推測來激勵自己，並勉慰別人。

發動絕食爭取自由

總統蔣公獲悉轉進越南的國軍，在各種艱困苦情形之下，仍能保持原來建制，維護各級

台的期望，竟毫無動靜，好在這時由台灣運到的服

喚召的國祖

裝、藥品、書籍、報刊，以及不分官兵，按月發給每人零用錢越幣二十元，使大家的精神與物質兩種生活，均獲得不少的改善。同時，政府已任命黃杰將軍統率所有入越國軍，成立留越國軍管訓總處，下轄三個管訓處，幾個軍官大隊。第二十六軍改編為第三管訓處。在越部隊經此納入完整的編制。

四十年五月間，由蒙陽運來三個軍官大隊，一所國立豫衡中學，使金蘭灣的國軍人數，已增至六千餘人，聲勢頗然浩大，法軍對我們的管理態度，又再進一步的客氣。在彭佐熙中將領導之下，官兵師生均能認清同舟一命，患難相顧。有時各以藝技特長，舉行康樂活動，稍紓愁懷。不論物質生活如何改善，精神生活如何調濟，還是沖淡不了追求回台自由的渴望，忘記不了韶華虛度的憂傷。

傳來消息，法軍在北越作戰，日趨失利，深恐一旦釋放我們，引起中共藉口參戰。所以法軍最高司令官塔西尼上將，對國軍回台問題根本拒絕考慮。情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顯示爭取自由的決心，以博得國際間的同情，用作政府強力交涉的後盾。這已成為全營區共同的意志，也成為與我過從較密的同事們朝夕研究的課題。

十一月底，國防部派駐留越國軍擔任連絡代表的梁漢少將，來金蘭灣營區訪問，我報請彭佐熙將軍召集高級幕僚和部隊長舉行一次回台問題座談會，一方面請梁代表報告政府最近交涉經過，及其不能成行的根本癥結何在。一方面研討如何建議政府再從多方面積極努力，以改變法方頑強態度，同時研究我們營區可否採取一種適當行動，配合政府外交上的進行。歷經三小時的座談，大家都能夠暢所欲言。經梁代表的報告中獲知黃司令官曾在西貢邀集少數人員，交換交涉意見，作成七點決議，交外交部法國科劉科長帶呈政府，

以供談判參考。因此我們不須再作任何建議。想來想去，惟有實施絕食運動，以驚動國際，警醒法人。當經決議成立「金蘭灣營區爭取自由委員會」推定委員十五人，並互選我為主任委員。

彭佐熙將軍和梁漢代表，原則上均表贊同，惟認為茲事體大，必須報准黃司令官默許，協同富國島營區一致行動，始能擴大影響。當時各出席人員堅決表示，不管黃司令官意見如何，富國島營區是否響應，我們決心要做。至於絕食日期，實施辦法，另由委員會研議決定，請梁代表把我們的意見和決心，代為轉報黃司令官。

座談會散後，我同梁代表很冷靜而具體的又談了一次，我們決定從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開始絕食，特別要求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再來一次。他答應回到西貢，報告黃司令官後，儘速趕來。

照會法方傳播世界

我會同爭取自由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秘密策訂了實施絕食辦法，也安排了各種必要的準備。

並擬將兩種文件：(一)向法軍提出絕食照會，先遣責他們不應背棄諾言，長期軟禁我們。再提醒他們，在前方以共軍為敵，連年苦戰不已，在後方拘留數萬反共伙伴，不使有回國自由，殊屬摧殘國際正義，蔑視人權尊嚴。又特別警告他們，中國匪軍如要公然介入越戰，隨時可以找到藉口機會，決不以我們的去留為條件。最後要求他們，立刻同意國軍早日回台，否則，將續採取各種不合作的報復運動。(二)向全世界宣告：在越法軍如何無理的剝奪我們的自由，以及我們如何正在過着被虐待的生活，呼籲各國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士，在這聖誕狂歡的時刻，不要忘記為民主自由而反共受難的鬥士，進而請求給予正確的聲援。

為溝通觀念，完滿推行，經將絕食辦法，發

交各級單位，秘密集合全體人員討論，如有礙難之處，可以提出修正意見，想不到各單位交回來的辦法，皆是千篇一律的決議：照案通過，保證貫徹。

在懷着緊張的心情，進行一項痛苦且帶有幾分冒險（怕餓壞人）的抗議運動之際，感覺時間格外來得快。一轉瞬間就到了十二月十四日。距離絕食預定期，只有十天了。按照工作進度的規定，在這天上午向營區法方負責人馬克少校提交絕食照會。請他迅速轉報法軍西貢司令部。梁漢少將亦適在這天下午趕來，我告訴他，絕食的照會，已經送交法方，不論他們的答復如何，我們將照原定計劃實行。他說：「黃司令很贊同你們發起的行動，惟深表關切」。

然後，我們一人對法方可能採取的反應，作了一個客觀的判斷：法方一定是怕我們絕食，引起國際上的責難，勢將出面勸阻。如期望他們因此能對返台問題立刻有所讓步，則可能性不大，但亦非絕無可能。所以他贊成我的主張，不管後果如何，幹了再說。第二天清晨，他帶着絕食辦法和兩種文件到西貢。黃司令官獲悉金蘭灣營區官兵的絕食照會，已經送達法方，立即親自攜帶有關文件，趕到富國島，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宣佈金蘭灣營區自聖誕節前夕起絕食三日，爭取自由。於是富國島官兵也採取同一行動，以擴大對法抗議的力量。

法方接到我們的絕食照會後，果不出所料，驚恐之餘，分別派遣高級人員，向西貢黃司令官和金蘭灣彭佐熙將軍竭力勸阻這一行動，並表示如有什麼誤會，可以雙方商量。這兩位長官均告以此乃官兵爭自由的行動，非指揮官權力所能抑制。法方雖知事態嚴重，但亦莫可奈何。

我們所期望於絕食運動的，是能激起國際上的同情，特別是民主國家能予以正義援手。如要達成這一目的，必須使絕食消息，能讓全世界知

道。因此，除請梁代表在西貢方面儘量設法外，我們會將兩件文稿，用無線電發到台北某單位，請其設法轉送香港各報發佈，事後，我們查悉果已辦到。這件前所未有的，驚天動地的悲壯新聞，在西貢法軍當局嚴密封鎖之下，仍得於耶誕節日，進入全世界每個愛好自由正義人士的心中。

絕食開始風雲變色

十二月二十四日，這淒楚的日子，果然匆匆來臨，上午在營區各要地掛好用中法兩種文字寫的標語，檢查各單位有關絕食的準備工作。吃罷午餐後，各單位按照規定，把所有剩存的主副食品，連同全部炊具碗筷，一律拿出堆在馬路中央，並由糾察隊逐一清點。下午四時，除彭佐照將軍二三高級長官外，六千多官兵，師生，眷屬，

全部集合於搭在海邊的司令台前，參加絕食開始儀式。爭取自由委員會，推我擔任主席，我站在台上，面對我們為爭取自由甘心受苦的弟兄，傷感得有幾分鐘說不出話來，眼淚直向下淌，內心痛如針刺，祇見下面一片沉寂，鴉雀無聲，不少的人在陪着我拭淚飲泣。一位同事走近我的身邊，喚醒我此刻必須堅強起來，說幾句話都可以。我咬緊牙關，握着拳頭，簡單地說明絕食運動的用意，要求克服短時間的折磨，求取未來長遠的快樂。猛抬頭看到一羣抱病參加的官兵，和幾個背負襁褓嬰兒的婦女，正站在司令台對面的高地。我忽然又被一種紛亂如麻的情緒，阻塞了欲語未完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另一位委員，馬上接着報告絕食期間應行注意事項，報告畢，各單位主管、官兵、學生代表

之號口呼兵官體全食布絕本作文者與染與者作本文日

(上) 情代(留) 在(下) 司令(越) 軍(留) 宣(越) 軍(軍) 第(三) 時(之) 形(情) 漢(總) 總統，反共抗俄

致啟書。最後高呼口號，宣佈散會。大部份官兵進入寢室靜臥，在馬路上露宿，就是海水的司令台上。最覺奇異的是：二十四日本來是一個風和日暖的大好天氣，忽然在大會散後，狂風大作，塵沙彌漫；烏雲密佈，天爲之昏，海濤

爲之咆哮，飛禽爲之哀鳴，使長達一公里半的營區，整個籠罩在沉寂，寂靜，肅穆的氣氛，三天不見炊烟，了無人聲。我睡在海灘上，難以成眠，口占一律如左：

不堪異域苦消磨。往事低徊涕淚多。
寧獲自由拚死鬥。豈甘奴役苟生過。

柳營炊斷三朝灶。海岸鹿封萬戶鍋。

今夜潮聲何事急。幾回夢醒泣烟波。

二十六日下午，西貢法軍總部連絡處處長戴樂里上校，聞迅趕來營區，要求我們推派一位代表與他商談，我們一致拒絕不去，後來馬克少校一再說盡好話，於是許華國中校陪我到法軍辦公室，同戴樂里晤談。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們為什麼要絕食？」我反問他：「一七八九年，你們法國為什麼要鬧大革命？」他默然無語。我又補充說：「你提出的問題，在您們法國革命所發表的『人權宣言』中不難找到答案」。他一時語塞，無以爲對。便轉了口氣說：「絕食解決不了問題，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雙方可以好好商量」。我說：「我們政府循外交途徑，同你們談了兩年，你們還是不肯放我們走」。我看他正在平心靜氣的傾聽着，趁機接着說：「你們過去說過的，甚至簽過協定的，都不算數，現在還有什麼好談？」見我說話的語氣，越說越倔強，便以更溫和的口吻，帶着請求的意味對我說：「爲着中法兩國的邦交着想，爲着你們的健康顧慮，希望你們立刻停止絕食」。我正在思索回話，他又繼續說着：「你們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們已經轉送巴黎，相信一定有合理的答復給你們」。「謝謝你的關注，等候你們的答復」。我沒有精神多談，說完這兩句話後，我們便起身告辭。

他莫可奈何地站起來目送我們離去。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許，梁代表來，他一下船便直接到司令台與我們見面，說黃司令及其隨員這幾天也在西貢未進飲食，富國島營區三萬人

的絕食辦法，完全與這邊一樣。黃司令官不放心這邊的情形，特請梁代表先來看看。我告訴他，截至此刻止，尚未發生任何不幸事故，大家都平安寧靜的餓着。同時又把昨天同戴樂里上校談話的經過告知他，請他速返西貢，轉報司令官，並設法蒐集各地有關新聞資料，以及法方的反應，加以綜合分析，呈報政府。打鐵趁熱，希望政府能據以即向法方強力交涉。以期這場悲壯的抗議行動，能够得到相當的代價。他看我有氣無力的談吐，未忍多坐，便起身到處本部慰問過彭中將後，返回西貢。

到了距停止絕食時間還有兩小時時，一位醫官看見我的精神顯得較別人格外衰弱，急忙從醫院拿來一瓶五百西西的葡萄糖汁，要我立刻打開喝下，我搖頭惋惜，一直挨到四點正，才領受這份盛情，要不是這瓶葡萄糖汁救了我，可能要被人抬進宿舍。這是我畢生難忘的創痛，也是造成我以後長年就診，頗難痊癒的胃病的主要原因。

民國十四年聖誕節總統蔣公特派慰表代將上文蔚林員委會問顧略晤者作文本與將上林為圖留越國軍將上林談將中熙佐彭為後之將

故事：一是法軍中一個摩洛哥籍的士兵，跟着我們餓了三天，人問其故，則說他與中國官兵命運相同。中國官兵絕食的目的，正是他多年痼疾以求的理想，願以消極行動，表示對中國同情，對法國抗議。另一位低級官佐，半夜偷入廚房，被太太醒來發覺，疑心他去尋找食物，連忙把他拖出來，責其寧可餓死，也不應破壞規定，這種大義無私的氣節，一時傳為美談。

餓的代價淚的回憶

由於絕食的消息，傳播全球，引起舉世愛好自由人士的注意，特別是民主國家的重視。獲致一連串如我們所預期的反響：

先是我外交部，在絕食運動過後，立刻送交法國政府一份措詞強硬的抗議照會，要求從速解決國軍回台問題。

接着在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黃司令官陪同林蔚文上將二度前來金蘭灣，向我全體官兵宣稱：「留越國軍必須儘速回台灣，這是政府堅定不移的政策，而且在原則上，已得到法方的同意。祇是遣送的技術，正在商榷」。

四十一年五月，我國防部成立留越國軍處理小組，由國防部次長徐培根上將兼主任，外交部司長兼副主任。負責對法連絡交涉，策劃接運安置等事宜。

其次，是四十一年元月初，美國駐越大使希斯，轉告尹總領事：「美國駐法大使，曾就留越國軍絕食事件，探詢過法國聯邦部長黎都諾的意見，表示美國政府非常同情中國軍隊的遭遇」。

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柯克夫婦，在香港看到新聞，特趕到西貢，訪晤黃司令官，瞭解一切狀況後，誠懇表示，同美後顧盡各種努力，促成美國政府幫忙。我認爲這是一線最爲可靠的希望。因爲其時法軍在越的戰事，遭受挫敗，已感戰力難繼，正想求美一臂之力。如果美國肯及時仗義力

言，則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再其次，便是法國的態度，開始急轉直下的改變。尤其在那位對回台問題深具成見的塔西尼上將，指揮作戰負傷，返回巴黎逝世後，繼任其職的薩爾將軍，在四十一年二月六日，即正式函告黃司令官：「只要一九五二年的預算公佈後，有關機構將研究改善貴營區內的生活條件，閣下現在即可告知貴部隊，他們所有的請求，會被友善地研究」。二月二十二日又向尹總領事表示：「只要中國軍隊同他合作，不再發起如去年聖誕節絕食那樣的事，他絕對同意儘速解決回台問題」。

法國政府主管留越國軍問題的聯邦部長黎都諾，這時也正在西貢，他坦率地告訴尹總領事：「我對這問題的意見，和塔西尼將軍不同，我認為三萬戰士的自由，實在不能再拖下去，能尋出一條遣送到台灣的路，還是當務之急」。

既然，法方兩位關鍵人物對問題的看法一致，使問題的癥結，從此消除，談判之門，大爲打開。

五月間，黎都諾部長訪美回法後，更具體的面告我政府駐法大使段茂瀾：「同意遣送留越國軍，不過要分批實施。第一批先遣送病患，老弱及婦孺等人，祇要不因此引起中共的危險反響，則繼續辦理全部遣送」。這種辦法，未爲我政府所接受。

後來，法方再度讓步，答應第一批遣送人員，增加健壯官兵三千人，仍然遭我政府拒絕。不是爲着法方提出逐步遣送辦法，以及運輸船隻，海上安全等問題，雙方反覆商討，拖延時間，我們也許早在四十一年夏間，就可投回祖國懷抱，不至留多吃一年苦頭。

欣見雨過天青，苦盡甘來，這不能不承認是絕食的代價，而我追述這些出死入生，忍辱負重的往事，又無異是一縷血淚的回憶。